

薛荣久：“WTO 研究”的开拓者

■本报记者 袁一雪

初识薛荣久，很难将他与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等头衔联系在一起。站在办公室门口的他，头戴毡帽，手上拉着一辆很多老年人都使用的两轮小车，耳朵里塞着助听器。

“听力不行了，现在已经离不开助听器了。”

在采访薛荣久的三个小时里，他不疾不徐的话语，让人仿佛回到从前，再次经历了我国从改革开放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再到近年来屹立于世界之林所经历的风风雨雨。

告诉中国“不是狼来了”

1936年，薛荣久出生在河北省迁安市，1955年考入对外经贸大学前身——北京对外贸易学院，主修对外贸易专业。1960年，本科毕业的薛荣久恰逢国家开设研究生制度，他追随“南马北袁”之称的著名经济学家袁贤能攻读国际贸易研究生，步入西方经济学说和国际贸易理论殿堂。

毕业后，薛荣久选择留校任教。1970年秋，他进入河南息县外贸部“五七干校”，劳动之余，抓紧时间背英文单词。1971年9月，接到学校复校命令，薛荣久夜以继日地读书钻研。

1974年4月初，薛荣久被借调到原外贸部国际小组，为邓小平在联合国第六届特别大会上的发言准备材料。“在借调的人中，只有我一人是助教，其他人都是教授和副教授。”薛荣久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回忆道。

因为这次机会，年轻的薛荣久开始接触众多国际组织方面的英文材料，激起了他对《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浓厚兴趣。“那些资料让我对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看法发生了变化，我意识到，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不是富人俱乐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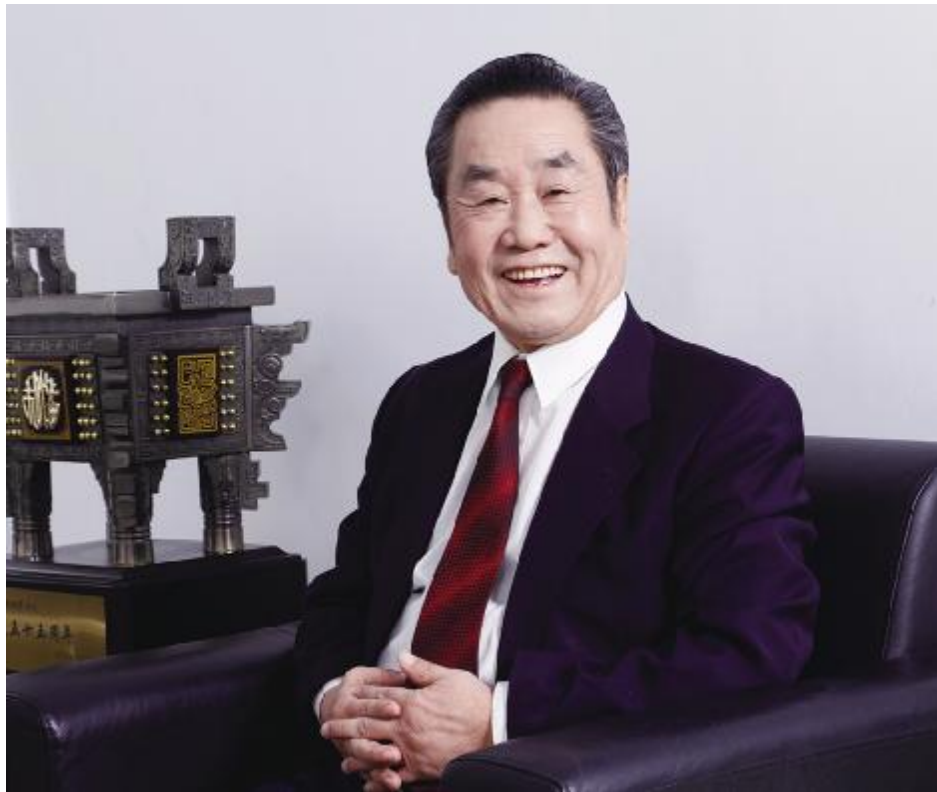
随着认识的变化，薛荣久更改了教学内容，“我希望更多学生能够正确理解关税与贸易总协定”。1978年后，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成为国策，众多的国际经贸问题出现。薛荣久也在1986年我国申请“复关”时，成为了原外贸部中国复关专家组成员。

1991年对外经贸大学创建关贸总协定研究会，随着中国复关—入世谈判的进行，该研究会转成为中国世界贸易组织(WTO)研究中心，薛荣久担任会长和主任。他深感，社会制度与经济体制的差异，让我国进入世贸组织的命运多舛。

也是在那个时期，国内不少人抛出了对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国内企业生存状态的担忧。“有人说狼来了，甚至一些知名企业家都如此表述。”薛荣久受邀参加中央电视台针对加入世贸组织录制的节目，并在最后点评说，“不是狼来了，是中国竞争与合作的伙伴来到了中国。”

为了缓解国内企业家的焦虑，薛荣久组织宣讲，让众人了解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面临的挑战与机遇。“我们希望国内人认识到，加入世贸组织是大势所趋，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是挑战，也是机遇，不应徘徊在世贸组织门外。”

在这一过程中，仅靠一代人的努力远远不够。他成为博士生导师后，开始为国家培养世贸组织方向的博士生。他在对外经贸大学创建了“世贸组织概论”的课程，主编的《国际贸易》《经贸研究与论文写作》和《世界



薛荣久

贸易组织概论》，被国内其他大学广泛采用。他认为，只有大学生深入了解如何让中国走向世界，掌握世贸组织的规则，才能让中国更好地为世界所接受。

机智应对行程中的突变

通过世贸组织的研究与工作方法总结，薛荣久也将此类方法应用到教学中。例如，他在受访时屡次强调在教学中注重“联想能力”，便是他在工作中最深的感受。

1999年，薛荣久带领四位年轻教师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合编世贸组织培训教材。其间，他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邀请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主题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日本和印度的影响”。

在登上澳大利亚飞往美国的飞机前，他收到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的电传，内容是学术会议主持者请他在会上专门讲一个问题——“中国现行的政治经济体制与世贸组织基本原则是冲突，还是吻合”。

面对如此敏感的题目，薛荣久第一反应就是推掉。但到了纽约，会议主持者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院长杰·思诺女士告诉他，接到邀请的另外两名中国人不能前来参会。“她再次强调要我讲一讲电传定下的题目，我推掉的想法落空。”最终，薛荣久扛下了重担。

回到宾馆，来不及倒时差，“我用联想的方式，纵览古今，从中国古代社会价值到现今的发展，再到与世贸组织的关系”。薛荣久回忆道。

演讲时，他提到，中国现行的政治经济体制与世贸组织基本原则有吻合的一面，也有冲突的一面。但改革开放后，中国现行的政治价值与世贸组织吻合的一面越来越占主流；未来，中国会像西方国家学习法规与文化，同时也将这些文化和规则与中国5000年的历史积淀相结合，“我相信，中国

未来创造的市场文化将会高于世界水平”。

这场近乎即兴的演讲，博得了国内外嘉宾的一致好评。会议主持者杰·思诺在总结发言中说，“薛教授解释了解我们的担忧”。

经此一“役”，薛荣久意识到，世贸组织中的其他国家更渴望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与内涵。也是从那时开始，他开始在学生培养中加入“联想能力”的培训。

1993年成为博士生导师后，他仍然为本科生上课，退休后一直坚持授课至80岁。

薛荣久把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培养方式定位为“学、研、悟”三个阶段。

“本科生注重的是打基础。为了加深他们的理解，我在讲课时不会将概念直接抛出，而是让他们与现实或者学过的知识进行关联，以讲为主，适当研讨。”薛荣久举例说，有一次在课上，他为了让学生理解矛盾的辩证与统一，让学生用所学的概念举例。顺差与逆差、出口与进口……一节课的时间，学生们归纳了270多个术语。总结时，薛荣久对学生语重心长地说：“未来你们的工作就是将国际贸易中的矛盾解决掉，达成统一。”

有时，薛荣久会把自己已完成但未发表的文章，去掉大标题和小标题，拿到本科生的课堂中，让学生分析，哪个部分是前言，哪里应加大标题，小标题的内容是什么，最后再为文章拟个大标题。之后，他会把整篇文章发给学生，再与学生进行交流；有时，他只留下大标题和小标题，让学生填充内容，以此锻炼他们的写作能力。

面对硕士生，薛荣久则更重视他们的思辨能力，教学方法以研讨为主，加强引导和点评，培养学生独立的研究能力。他将课堂布置为会议现场，让硕士生分为正方、反方和第三方，由正反方进行辩论，再由第三方总结。薛荣久是旁听者，只提供思路。令他难忘的是，有时学生们对于一些问题的争论会从教室延续到宿舍。

而在博士生教学中，他则会通过教师的现身说法，提高学生的扩展性、前瞻性思维。

“我讲课的时候会观察学生的眼睛，如果他们眼睛一直眯着，我就会赶紧调整讲课方式，直到看到他们眼中光闪过，我就知道他们听懂了。”薛荣久说。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他根据中国人世人才的需要，于2003年创建“世界贸易组织概论”课程。他主编的教材《经贸研究与论文写作》成为北京市优秀教材。

2003年，薛荣久获得北京市首届“高校教学名师”称号。他主讲的“国际贸易”和“世界贸易组织概论”成为国家级精品课程。

2007年，早已退休的薛荣久依然站在讲台上，他为自己定下了三条规定：第一站着讲课，第二写板书不提笔忘字，第三有联想和表达能力。“第一条是我要尊重我讲课的人；第二条是我对自己的要求，如果有一天我提笔忘字，可能说明我的脑力已经跟不上教学过程，那么我就考虑退下讲台；第三点是我始终强调的。”薛荣久一直这样以身作则。

80岁后定下六个目标

为加强学术传承，2012年后，薛荣久相继主编了《袁贤能著述文集》和《姚曾荫著述文集》。2018年，他还撰写出版《中国对WTO规则的恪守与砺进》一书，明示中国人世后对WTO规则的恪守与作为。

2019年12月31日，对外经贸大学举办了“全球贸易治理体系变革研讨会暨薛荣久教授从教五十五周年纪念活动”。84岁高龄的薛荣久在会上为自己的余生定下了六个目标，包括写“我与经贸大学”的书，讲述如何研究国际贸易和世界贸易组织的著作，分享教学理念的文章、个人著作编目等，如时间允许还想写一本自传。

“我已经奔90岁了，这六个目标是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见证。”薛荣久感慨地说。为了跟上时代的发展，他在61岁时，向上一级的小孙子请教拼音，直至熟练使用电脑进行打字。毕业后退休，他从未离开过对外经贸大学。他希望通过写“我与经贸大学”的故事，让人们看到对外经贸大学的发展历程。

至于“讲述如何研究国际贸易和世界贸易组织的著作”，则是因为国家十年政治动荡与三年自然灾害给薛荣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深知中国今天的繁荣来之不易，“我希望通过我的写作，让更多人知道中国曾经经历的困难，做好面对未来困难的准备。”

分享教学理念是他在教学育人过程中，不断反思摸索后的心得——首先，要坚持研究方向，将研究问题吃透，再跳出来，才能将基础知识与现实融会贯通；其次，他自创了“鱼骨式”研究方法，即先研究主要矛盾，再研究次要矛盾，遇突发问题才能准确找到所需“鱼刺”内容；再次，逆向思维，遇到问题先考虑问题的背景，再提出解决方法，让解决方法更有大局观。

至于个人传记，不是个人标榜，而是薛荣久为他的老师写传记时，感到自己的责任更重大了。“学术传承之前，必须要了解曾经经历的事情。希望更多人通过我的传记了解到，中国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未来国家遇到困难时，需要有后继挺身而出，而不是只会坐享其成。”



严丽(右一)与同事们在医疗工作现场

不久前，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内，作为武汉市首批接触、救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医生，该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严丽谈到近期的经历，几度落泪。

“确实挺难的，我们医护人员也会害怕，但更多的是感动。战斗的集结号已吹响，我们会一直撑下去，直到春暖花开。”严丽说，面对新疾病，不能掉以轻心，更不能失去信心。她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

落泪的“铁娘子”

45岁的严丽已经从医22年了，是医院急诊科的“大管家”。作为一个全年不休、24小时运转的科室，同济急诊科面对的多数是危重症患者。因为行事果敢、性格刚直坚毅，严丽也就有了“铁娘子”的称呼。

2019年12月底，武汉发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不少病人流向同济医院。在急诊科下夜班后，严丽和同事们还要去支援医院的发热门诊，每天白天、黑夜连轴转，不仅工作强度大，风险也不小。作为一线医务人员，严丽深知自己属于高危易感人群，因此，她第一时间从家里“隔离”出来，独自住在刚装修、尚未透气的房子里。

然而，1月5日，严丽查体温时，还是发现自己发烧了。

“当时，最害怕的不是自己发烧了，第一个反应就是我去过哪里，我有没有可能给别人带来危害。”严丽哭着说，在SARS时期，她也是一线医务人员。不过，当时她还年轻，并没有太大的压力。“老师们怎么说，我就怎么执行。”如今，她变成了那个“说”的人。作为急诊科的老医生，她并不惧怕疾病本身，而是害怕自己将疾病传染给患者或同事，又因为自己倒下，让一同战斗的年轻医生们失去信心。

所幸，经过系列检查证实，严丽患上的并非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经过一天的短暂休息与治疗，她顺利退了烧。

不愿做一个“逃兵”

退烧后的第3天，严丽再返急诊科，同时参与发热门诊工作。

“没办法，病人太多，医生很紧缺。我多休息一天，他们就要多承担一些，而他们已快到身体极限了。”严丽说。

考虑到严丽是一位住过7次院、开了4次刀的患者，加上长时间工作没有休息，身体也出现过状况，科室负责人和同事建议她按照原计划，正常休假。

在同济急诊科，休假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三个月前，为了兑现对丈夫和两个孩子的承诺，严丽提交了休假申请，希望能在1月20日开始休假，医院批准了她的申请。

1月20日，严丽如约带着家人来到机场。眼看要踏上旅途了，严丽却没有休假的轻松愉悦，心里一直无法平静。临近登机时，她接到科室电话，知道两个同事生病后，果断撕掉了手中的飞机票，跟科室主任打电话，决定重新回到医院，与同事一起继续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两个孩子不理解，抱着我说我的承诺都是白承诺，从来就没有兑现过。丈夫还是很能理解我，说你回去吧，回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样你才能心安。”严丽说，她也没有什么高尚的情操，只是觉得现在一线医护人员本来就紧缺，自己一辈子没当过逃兵，这一次也不能离开。

“我也害怕，我也很累，但怎么办？路都得走下去，医院里有我的战友，那里是我的战场，回去才是医生的使命。这个时候就只能遵循本心，也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内心的平静。”严丽说。

坚持到春暖花开

回到医院后，严丽重新回到连轴转的工作状态。什么是发热门诊？据严丽介绍，医生进入发热门诊，意味着要身穿全套的防护服，一坐就是10-12个小时。

“你可以想象一下，穿着一套不透气的套子，坐在一个地方，不吃、不喝、不上厕所，一坐就是10-12个小时，那就是工作。”严丽说，因为身穿防护服，她只能在中午快速吃饭，其他时间就连喝水和如厕都不行。穿上防护服久了，呼吸也会受到影响，时常会感到胸闷、呼吸困难，说话明显要比平常费力一些。写病历也会变慢，打电话时，甚至会觉得对方的声音很遥远。

每次从发热门诊回到住地，严丽才有一点点如释重负的感觉。

“那时，并不想自己会不会被感染，而是觉得终于可以睡觉了，这比什么都好。”严丽说，她将自己从家隔离出来，安排好家人后，就已经做好了面对一切的心理准备，也不再害怕自己有危险。

春节期间，医院周边的餐馆都放假休息了。独自居住的严丽，伙食从盒饭变成了泡面。“这样吃下去，估计之前减掉的肥肉又会回来了。”严丽调侃道。

不久前，一位同事给她送来了鸡汤改善伙食，这让她感动不已。“还有很多认识或不认识的人给我发来祝福，让我注意身体；医院从未打过交道的保洁阿姨看到我，说‘辛苦了’；救治转运有需要时，即使是凌晨时分，也是一呼百应，医院各个处室、科室的领导、同事都非常支持我们。”严丽说，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她和同事们都很劳累，但收获更多的是感动。

“我们所有的人，不是我一个人，都是拿命在拼。没有休假的也不是我一个人。”严丽说。

“集结号已经吹响，不是说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只是这场新型冠状病毒的突发程度，超过了大家能控制的状态，一切都是突变的。我们相信坚持才能迎来春暖花开！”严丽相信，只要坚持下去，携手向前，一切都会好起来。

(本文根据华中科技大学提供材料整理)

林峻：与疫情赛跑，快速研发试剂盒

■本报记者 温才妃



林峻开发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盒

近的生活带来了不一样的节奏。

1月31日，福州大学宣布自主研发出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盒（以下简称试剂盒），并与泰普生物科学(中国)有限公司合作，迅速实现产学研转化，成为国内首批完成病毒快速检测技术体系的机构之一。

试剂盒为冠状病毒疑似病人带来了快速检测的便利，在疫情爆发的当下来得格外及时。而福大试剂盒的研发者就是林峻。

敏锐的科研嗅觉

2019年12月底，国内媒体零星报道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事件，从事体外诊断研究的林峻听到业内人士在朋友圈里讨论这件事时，敏感地嗅到了一个科研机遇。“越聊越感觉紧迫与重要，于是马上查找资料，投入到紧张的研发当中。”

“当时根本没有想到会演变成今天这样‘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局面。我当时更多地想从技术储备角度做研究，这是一个新病毒，作为科研人员，就有做该病毒检测技术的必要。正好，实验室的技术平台、技术储备、实验方法都成熟，就顺手把这件事做了。”林峻说。

1月13日，试剂盒在福大实验室里研发成功。而那时，媒体还没有大规模报道新

型冠状病毒。

一周后，舆论铺天盖地而来，而林峻已经依靠学校的产学研体系，找到了有生产资质、生产能力的厦门泰普公司。双方一拍即合，投入到紧张的产业化过程中。

截至1月31日，全国已有90多家企业、高校宣布拥有生产试剂盒的能力。但是，真正研发出试剂盒的机构数量有限，那么福大试剂盒有什么特点？

林峻告诉《中国科学报》，目前大部分厂家使用的都是荧光定量PCR技术，但细节方面每家都有自己的智慧。福大试剂盒在靶点的选择上做了很多优化与设计，拒绝漏检，灵敏度高；检测的实现过程采用一步法操作，耗时短(2小时左右)、步骤简便；具备严格的质量控制等特点。

10天的产学研合作纪录

开发试剂盒的技术难度不大，林峻并不否认。

但是，试剂盒从研发走向市场的过程，并没有人们想得那么简单。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较量，中间任何一个环节受阻，都不可能顺利到达终点。畅通的产学研体系，为福大试剂盒的开发提供了快车道。

“对于实验室开发的科研成果，学校给

予了科研人员很大的权限，让我们寻找合适的企业去做成果转化，并鼓励我们把产品做出来。”林峻说，此次对接的泰普，就是他曾经接触的一家业内知名的生物科技企业。

然而，非常时期的车道却未予便利。

1月28日，正值疫情爆发最严重的日子。企业一通电话，请求林峻技术支持。上午10点，林峻做好防护措施驱车从福州前往厦门，突然发现路上多了许多安全检查，以及道路封闭，“原本3个多小时的车程，绕了好多路，开了4个多小时才到厦门”。一到企业，他便投入紧张的生产线指导工作中，当晚10点才匆匆回到福州家中。

然而，这次产学研的经历，却刷新了他以往的产学研合作纪录——仅用了10天时间，速度惊人。这其中少不了高校、企业为抗疫作贡献的社会共识。

赶在1月31日前后，该产品筹备批量生产，并正通过快速通道申报“国家第三类医疗器械证书”。首批产品将以捐赠的形式于近日派发到相关医院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这是我的本职工作，并没有觉得有多么了不起。”谈及这次经历，林峻谦虚地说，“我国高校多重论文，做应用性研究的教师能发表的论文较少。我希望疫情面前应用研究可以造福社会，也希望更多人关注高校里做应用性开发的教师。”